

書 評

《論戴震與章學誠》

余英時 著

(香港龍門書店出版, 1976年, 頁1-10, 1-373。)

清代中期學術的發展, 有兩個人算得高峯的, 一個是戴震, 代表著考證學方向的新轉變; 一個是章學誠, 代表著史學方法論的新興起。而這兩個人的學術, 還有一個連貫的性質, 但是一般學術論著, 未曾特別注意到他們關係中的意義, 這是對於此書應當格外注意的。其次, 尤其是章學誠, 在清朝一代總是晦而不彰。甚至《清史稿》中給他立傳時, 把姓名都弄錯了。直到民國初年, 才漸次被學術界看重起來。但是他的學術地位, 還是被認為劉知幾和鄭樵以下系統中的繼承人, 並未曾把他的地位特別提高。在這部書中把他的見解和二十世紀史學方法論權威的柯靈烏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 來比擬, 這才算真正了解章學誠的地位。

本書分為內外二篇: 內篇先談章實齋的史學觀點與清代學風, 再談戴東原對於義理、考證兩項的徬徨歧路, 然後再歸宿到義理。外篇談戴東原經學路徑的轉變, 再比較戴東原與伊藤仁齋、章實齋與柯靈烏, 然後再對於章實齋與董二樹一條重要史料加以辨證。最後係附錄; 有戴震的《孟子私淑錄》, 錢穆的《記鈔本孟子私淑錄》, 戴震與段玉裁《論理欲書》附胡適跋, 章學誠《章氏遺書逸篇》計十四種, 這都是不常見的文獻, 對於本書的了解都是非常重要的。

戴東原和章實齋雖然只是兩個人的關係, 實際上卻是千頭萬緒。因為中國學問的發展, 自漢代以來都是多少帶著宗教性的, 即是一切傳道受業的方向, 除去了釋道兩家以外, 差不多都是為著儒家的聖賢之道, 成為一個直線下去的。所以不僅《六經》為著明道, 就是史學和文學也一樣以為著載道。在本書中明白的指出來, 清代考證之學, 也就是所謂漢學, 實際上還是宋學的延伸。例如:

清代的考證學應該遠溯至明代晚期的程、朱和陸、王兩派的義理之爭。由義理之爭折入文獻考證, 即逐漸引導出清代全面整理儒家經典的運動。(頁15)

在書中指出來, 朱學的根據是《大學》中的「格物致知」, 而王學的根據是所謂《古文尚書》中的「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也就是所謂「十六字心傳」。這兩條嚴格說來, 都有問題的。王學者攻擊《大學》, 起於晚明劉宗周的《大學

古文參疑》，而其弟子陳確的《大學辨》更為完備，證明了《大學》為秦漢時代的作品（也就是起於後儒，並非曾子的手述），這就是使說《大學》為孔門「一貫之道」的，黯然失色。

但是《大學》一篇雖然被證明為秦或西漢儒生所作，究竟還不算十分嚴重，因為反正總是儒生的作品。這些儒生作品，即使是東漢時所完成的《白虎通義》，也不是沒有一顧的價值。如其一個重要根據被證明為非儒家的，情形就十分嚴重了。然而「十六字心傳」就居然有這種情形。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是清初學術史震撼一時，並且也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著作，在經學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他著此書的背景，卻不是為考證而考證，而是出於程、朱派的立場，要打擊王學十六字的心傳證明出於《道經》的。至於做《尚書古文冤詞》的毛奇齡，雖然反駁閻若璩失敗了，但他的立場卻又是站在王學的立場來反對朱熹。這個考證公案，實際上還是出於宋學中朱、王兩派爭執的動機上。

漢學的宗師，要溯源到清初的顧炎武，而顧炎武的立場，又是程、朱之學。但是漢學進展下的考證之學，到了清代的乾、嘉時代，所表現的程、朱立場，也就減弱了。清初是朱學和王學的對立，而乾、嘉時代就變為考證和義理的對立。其中最為明顯的，是主持《四庫全書》修纂的紀昀。但是考證和程、朱學派的關聯，仍然還有一點殘存的遺跡。其中江永就是服膺程、朱的。戴東原在早期似乎也受到了江永等人的影響，除考證以外，也追隨程、朱義理的途徑。

除去了紀昀以外，當時經學大師惠棟，也是反宋學的。在他的《松崖筆記》曾說過「宋儒之禍，甚於秦灰」。戴東原在到北京的次年（1755），即就館在紀昀家，而他在1757年遊揚州，又看到了惠棟，談論甚為相得。在此以前，戴東原還是追隨宋儒義理的，到此以後，才轉變起來，可見和紀昀及惠棟的主張應當有關的。但是戴東原對於「義理」卻不會完全放棄。他知道不論程、朱，不論陸、王，都攙雜了道、釋的成分。他要做一個沒有道、釋成分的「義理」。這就是他的《原善》、《緒言》、《孟子私淑錄》以及《孟子字義疏證》等書寫作的來源。

戴東原這種「義理」上的見解，是有十分自信的。但就客觀環境上來說，卻是孤立無援的。這種見解在考證派來說，是不值得去做，就義理派來說，那是異端。也就造成了由程、朱派來看，比陸、王派更為異端，由陸、王派來看，比程、朱派更為異端。他在北京時期一直不敢明白的宣布，所有的措辭都保持一個分寸。他也很想早點在本籍找一個書院，藉此傳播他的義理心得，但是當未來得及回籍，他就逝世了。他把他的看法交給他的得意學生段玉裁。段玉裁原封不動的刻出他的《孟子字義疏證》，但段玉裁一生中，除了繼續做考證工作以外，對於他的義理方面不再繼續去管。直到民國初年，方始有胡適之先生及梁任公等人加以表揚。

章實齋看到戴東原，正在戴東原看到紀曉嵐的十年以後，這一年是乾隆三十一年

(丙戌1766)，在同一年中戴東原完成了他的《原善》三篇的擴大本。章實齋入京以後，受到了朱筠的影響很深，朱筠是主張不可以不加徵實，而空談義理的。這時候錢大昕和戴震是考證方面領導人物，章實齋當然要看一看他們，一談究竟。等到章實齋看到了戴東原，戴東原把有關孟子性命的問題說給他，他受到了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最先他還一直想走戴氏的路，以後他幫畢沅作《史籍考》，他又把這種義理的方法，採用到史學方法上去，這就形成章氏的《文史通義》的路。

在戴東原卒後，章實齋有《答邵二雲（邵晉涵）書》（見本書頁六引），書中言：

來書於戴東原自稱《原善》之書欲希兩廡牲牢等語，往復力辯，決其必無是言。足下不忘死友，意甚可感！然謂僕為浮言所惑，則不然也。戴君雖與足下相得甚深，而知戴之深，足下似不如僕之早。丙戌春夏之前，僕因鄭誠齋太史之言，往見戴氏休寧館舍，詢其所學，戴為粗言崖略，僕即疑鄭太史言不足以盡戴君。時在朱先生之門，得見一時通人，雖大擴生平聞見，而求能深識古人大體，進窺天地之純，惟戴可以幾此。而當時中朝荐紳負重望者，大興朱氏，嘉定錢氏實為一時巨擘。其推重戴氏亦但云訓詁名物，六書九數，用功深細而已。及見《原善》諸篇，則羣惜其有用精神耗於無用之地。僕當時力爭朱先生前，以謂此說似買櫝而還珠。而人微言輕，不足以動諸公之聽。周旋嘉定，大興之間，亦未聞有所抉擇，折二公言，許為乾隆學者第一人也。惟僕知戴最深，故勘戴隱情亦微中，其學問心術，實有瑕瑜不容掩者。

這一段實在對於章實齋與戴東原的關係以及章實齋對於戴東原的看法，一個非常重要的史料。這一部書根據這一段重要史料，做一個很透澈的分析，反映出清朝一代學術的變化與消長。真可以做一個新史學方法的示範。作者自己未嘗聲明用的是柯靈烏的方法，實際上是很成功的用了柯靈烏的方法。

本書討論章實齋的史學觀點及史學思想，也是本書的非常精采部分。其中如內編第四章『章實齋的史學觀點之建立』以及外編第三章『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都是專討論章實齋的。在中國過去討論史學方法一層，已有長遠的歷史。但專門討論史學的，實從劉知幾《史通》開始，再經過鄭樵的《通志序》，然後再到章學誠。其中參加這種著作的，實在寥寥可數。章實齋從考證之中解放出來，確實受到了戴東原的啟發。但他從考證轉為史學，卻仍不為戴東原所欣賞。他們雖然應有討論，可是不會有結果的。所以他在『記與戴東原論修志』（引見本書31頁）說，「戴君經術淹貫，名久著於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與余言史事，輒盛氣凌之」。他說戴東原「不解史學」是相當重的話，這是章實齋已有他的特識才敢這樣說。憑他堅強的個性，卓絕的心得，給予史學以獨立的地位。所提出來的「六經皆史」說，誠然和一般人看法不同。專就史學家立場來說，雖然是章實齋故作驚人之語，但就歷史在學術地位的廣大領域來說，認為

「六經皆史」在邏輯上是沒有甚麼不可以的。史學既然具有學術上獨特的地位，所以史學可以「成一家言」。章實齋曾為梁任公所推重的，但其「六經皆史」論，梁任公也不盡理會，他認為改為「六經皆史料」更好些。其實章氏的原意決不是把《六經》看做史料，而是由於《六經》代表中國的人文傳統。而這個人文傳統，歷史卻可以充分表達。他在《文史通義》中的『詩教』、『書教』等篇正是發揮這個意思。

就劉子玄、鄭漁仲和章實齋三人的造詣來說，劉子玄的《史通》的體裁很像清末葉昌熾的《語石》，可以算一部分類的史學史，而不是一部史學方法論。至於鄭漁仲，他本人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但卻也相當油滑，時常有「英雄欺人」的行為。若就他的《通志序》來說，不論他說的他自己是否真能做到，可是他卻能夠抉出史的真相，發前人所未發，這就使章實齋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之下推崇他，認為他是一個千秋知己。但實際上章實齋的造詣，卻非劉子玄及鄭漁仲所能企及。他真的樹立一個新史學的系統。這個史學思想的系統，是從「六經皆史」這個文化整體觀出發，而集中於《尚書》中「疏通知遠」的意義。引申起來，也就不能承認「記言」和「記事」有任何的分別，和柯靈烏意見是一致的。柯靈烏認為內在的思想乃是核心，外在的事實反為次要，歷史家探討事物，必須深入當年人們思想之中，而探索到歷史的過程，所以歷史也就是思想的歷史。從秉筆的歷史家來說，就成為筆削，也就是在柯靈烏所說的「史料取捨」，「歷史建設」和「歷史批評」三步驟上面。

以上的敘述，只是一個概略，其中的重要考證，當不能一一指出。無論如何，此書確是一部很值得推薦的書。從另外一方面說，我也有一點補充的意見。第一，章實齋本人雖然不是一個宋學家，但他的生活態度，卻受到理學的影響很重，他自己是一個謹飭而誠篤的人。他對於袁子才的「文士作風」就很看不上。章實齋對於戴東原一直是欽佩的，他心目中的戴東原是一個學行都可以做人師表的人，但結果他以《春秋》責備賢者的原則來看戴東原，就不免失望了。本來在一個社會之中，完人很少，以品格來論，其中優劣比例，是一個常態曲線。真是拿定主意，「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的人，究竟不多。宋儒中如程伊川那樣壁立千仞，理欲分明，也只有伊川自己能做到，而不可以期望全社會都是聖賢。章實齋以聖賢來期望戴東原，那是錯了主意。章實齋本人確是一個信仰堅定的人。他在鄉試雖久困場屋，可是在會試中就聯捷成進士。一般進士如其不入詞林，最常見的出路是即用知縣。在分發行省以後，很快就可以補缺，而且在進士班中補到的都是繁缺，這在生活上補助很大。後來以進士資歷監修方志，也可以勞績保舉州府。但他一直沒有去做，他一直專心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他是這種態度，也希望戴東原也是這種態度，等到他發現了戴東原的人格不是他所想像那樣完整時，就不免情見乎辭，以為「心術」上有問題了。（這一點和「狐狸」「刺蝟」不同的理論仍是一致的）。

第二，戴東原雖然學殖深厚，究竟基本上還是一個利祿中人。他希冀的「兩廡牲牢」也可以說是具有身世之感以後，一種心理上的發洩。戴東原本來才智過人，但除去

到京以後，享有高名以外，在事業上並不得意。他本來久困場屋，等到鄉試捷後，會試的門坎一直無法超過，等到從《四庫》館的勞績，經過紀曉嵐的力薦，得到欽賜翰林一個殊榮以後，身體已經壞了下來，即使想在事業上有所樹立，已經來不及了。戴東原是南方人，（這一點和紀曉嵐是北方人習慣不同，即使戴氏住在紀家，也不習慣。）在飲食上吃白米的。北京煮飯的習慣是先煮一次，棄掉米湯再蒸，只剩下殘餘澱粉，這可能是他足疾不能痊癒的最大原因，假若不能接受北方的飲食習慣，即使吃肉，吃「珍饈」，也無濟於事。尤其可以注意的，是戴氏得病在五十三歲以後，亦即入翰林以後，生活較優裕，而身體反而壞了起來。這就表示吃米更為精細了。至於章實齋也是南方人，卻未患戴氏的病。或由在京的日子少於戴氏，也可能兩人生活習慣不同，現在雖不能詳悉，但戴氏的健康影響到他的思想，應是一個事實。

第三，就戴震的性論來說，就考證的立場來說，可以說是無懈可擊；若就義理的立場來說，還是處處是漏洞。戴震所以能夠想到這個地方，是因他還是考證出身，章實齋所能夠欣賞戴震的性論，是因為他還是在周圍的考證的環境中，用考證的方法去想。不錯，假如不看孟子以後的書專就孟子的思想來發揮，是可以形成《孟子字義疏證》這一個系統的。但孟子以後，諸家所以不同於孟子的原因，實緣在孟子學說之中，遇到了不可排除的困難，才有以後各家的新說。這些新說對孟子原始性的學說，不僅是一些修正，而且是一些進步。戴氏依照考證的方法，追求原來的孟子思想，完全不顧董仲舒「性」與「情」的分別，為甚麼要提出；李翱的復性論為甚麼要做；宋儒為甚麼要加強天理和人欲的區分；那是很不實際的。就哲學史來說，這是一個逆流。

誠然，董仲舒的思想，是至少有一點受荀子的影響（當然他的基本思想還是孟子的，只是受了荀子的影響，才有這必要的修正），而宋明理學不論是程、朱，不論是陸、王，也都受到了佛老的影響。這都是不容諱言的。不過還是要更完整的哲學系統呢？還是只需停留在孟子的階段就算滿足呢？這在清代尚古學風之下，是不能明白承認的，但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在良知上卻不能牽就的（孟子確是最先言性的人，孔子實在未講過。「性相近，習相遠」一句，意義不明不能算。因為孟子最先講，還未曾發現困難問題。所以孟子雖有大貢獻，卻不能以孟子所言自足）。所以談論上是一件事，實用上又另是一件事。戴氏是一個反宋明理學的人，以引入異端攻宋明理學，確使宋明理學者無辭可對。但破壞易而建設難。戴氏對自己系統一直未曾建立到成熟地步。他所講的一直是講善而不曾講到惡。只說「偏」、「私」、「蔽」等泛泛的字，對於罪惡的了解太不夠。尤其把「欲」包入「性」內，就更為困擾。如其對罪惡來源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那就除去最後還是承認「性無善惡」以外，更無他法。但如承認「性無善惡」，那就又不是孟子的思想了。

第四，本書中揭明了當時極端揚漢抑宋的人，一個是紀昀，一個是惠棟，這兩個人確實是當時學術界的領袖。所以會要再向深推究一下。紀曉嵐和惠定宇的立場，本不是

想像中那樣簡單，和范縝那樣，屬於物質主義者。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中，誠然有譏諷宋學的地方，但講「因果報應」的，更觸處都是。在『灤陽消夏記』中，就有這樣一句話：「案輪回之說，儒者所關，而實則往往有之，前因後果，理自不誣」。這不是擺著面孔來說話，可以代表出他的心聲。至於惠定宇的《太上感應篇注》，處處表現他尊重《太上感應篇》，篤信《太上感應篇》，顯然他是很誠篤的，出於他的宗教信仰。此外尚有錢大昕，他對於趙翼的《二十二史劄記》的稱讚，出於真誠，但趙翼的劄記中談因果報應的，不可勝數，這一點錢大昕就顯著沒有甚麼不可以承認的。至於程、朱學派的彭紹升，更不用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這是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從明代中葉以來，中國社會已成為一個以中國固有的道德傳統和道教及佛教並容的社會。也可以說這就是一種「中國教」（現在的「印度教」就是一種雜糅的宗教，為甚麼中國並容的宗教，就不許稱為「中國教」？）這個「中國教」，正是維持中國社會的安定的一個極大因素。曾國藩討洪秀全檄：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惡，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神鬼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於冥冥之中者也。

曾氏這一段是真心話，決不是表面上的宣傳。自從近六十年來，先後許多當政者以及學術人士的積極反宗教行動，使得在中國社會上固有宗教的虔誠，僅餘殘影。但無論如何，宗教在社會的功能方面，仍居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國人究竟是中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前途來說，中國民族文化的傳統是無可替代的。過去在清代漢學運動之中，漢學的研究，只是一種職業，其安身立命之處，還可別的因素在。這也可以看到清代學者在相異之中，還有其一個共同點。

第五，章實齋的史學思想，不僅是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創新的境界，而且和近世的柯靈烏思想竟相暗合，可見凡是有價值的思想，其脈路是可以達到一致性。在此，柯靈烏和章實齋殊途同歸，這一個很有趣的事實，是可以敘說一下的。柯靈烏受到哲學家，尤其是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的影響，是顯然的，在柯靈烏的著作中也常常引到克羅齊。克羅齊對於史學的見解，認為歷史遠於科學而近於藝術，這和柯靈烏頗有出入。但克羅齊認為歷史的方法也就是哲學的方法，這卻為柯靈烏所採取。克羅齊的書是一般都認為很難看懂的，因為其方法都是哲學的思辯方法。柯靈烏的方法，是以思辯為主，也就是西洋傳統的哲學方法，一步一步的推進，這和中國思想單刀直入，直指微玄的，全然異致。章實齋的學術造詣誠然獨到，但不拿柯靈烏的史學方法來比較，來解釋，也就無法了解。因此章實齋的見解縱然獨到，但章氏同時代的人把章氏思想認為是「陳腐取憎」。為著得到讀者的了解，為著學說本身進一步的發展，我們

過去傳統的辦法，如同韋氏所用的表現方式，確實尚有要加以注意再求改進的必要。

這些意見，可以說完全由於這部書所啟發。如其看不到這部書，以上的意見即使和本書不一定全部有關，也是無所想到的。

勞 翰

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A Selective Survey of 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s Operations, 1842-1895. By Edward Lefevour.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68. vii + 215 pp. Bibliography; Index.)

自鴉片戰爭後，隨着中國門戶的開放，外國商人紛紛在中國的通商口岸設立洋行，發展對華貿易。其中英國怡和洋行所扮演的角色，尤為重要。該行的業務範圍，日益擴大。鴉片的販賣不再成爲公司的主要經營，另一方面，航運、保險、銀行業務，以至對中國政府的貸款，卻成爲該行的投資對象。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怡和洋行與滙豐銀行，可說是代表英國在華經濟利益的二大支柱。透過對上述西人在華企業的研究，不單有助於我們瞭解這些企業在華的活動情形，在某種程度來說，西方列強的對華政策，以至中國方面的政治、經濟等措施，也可以部份的從中反映出來。馬士（H. B. Morse）根據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撰寫成五巨冊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在1926年由牛津大學出版。自此，學者即步馬士後塵，從西人在華企業的檔案中，找尋研討的目標。其中藏在劍橋大學圖書館的怡和洋行檔案，更是他們所垂注的對象。近三十年來，中外學者如佩爾科維茨（Nathan A. Pelcovits）、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erg）、劉廣京、郝延平和費伊（Peter Ward Fay）等，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透過對該批檔案的研究，成功地撰寫了一批極有份量的著作。雖然學者孜孜不倦的利用怡和洋行的檔案，但在本書面世前，卻沒有一本對該公司在華經營的活動，記載得較為有系統而全面的著作。因此，本書的問世，無疑使我們對這個執西人在華企業牛耳的機構，獲致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在本書的導論中，作者指出怡和洋行在倫敦的合夥 Matheson and Company 的紀錄已經毀滅不存，而後者對怡和洋行的經營決策具有極大影響力，因文獻不足的關係，無法把怡和洋行的組織、控制及管理，劃出一條明顯的發展途徑。本書的重點，因此不是以研究怡和洋行的歷史爲對象，而是透過該洋行的經驗，說明十九世紀西人在華企業極富適應能力，並對該洋行在中國社會所起的作用及反應，提供重要的例證。

全書除導論及結論外，共分七章，另有附錄五。前三章重心在於說明由於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的性質及經濟情況，迫使怡和洋行改變其正常的業務習慣，作出相應的調整和適應。從這三章的標題「鴉片貿易」、「棉花貿易」、「貿易中的轉變時期」，即可看